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人物春秋】	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苗长青
【百家争鸣】	毛泽东究竟何时提出“刘邓可以分开”	窦应泰
【亲身经历】	我参与处理“揪刘火线”	华方治
【往事非烟】	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与反思（下）	阎 淮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人物春秋】

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 苗长青 •

◇ 遭到批斗和关押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湖南，大中学校陆续宣布停课开展“文化大革命”，大中学校学生率先起来造所谓“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等宣传单位，展开了对湖南大学副校长魏东明、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林增平等人的批判。

随后，运动迅速向全社会扩展，各单位掀起揪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的狂潮，一大批有才学、有成就、有影响的科学家、教授、作家、艺术家、编辑、记者等受到批斗。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所谓“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

8月12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二届十三次会议，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书记处书记华国锋传达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听了传达后，特别是听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与会者忧心忡忡，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是不是也要被“炮打”。

此后，局势更加混乱，运动矛头的重点转到“炮轰”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街游行、冲击党政机关、召开批斗大会等现象不断发生。9月9日至12日，长沙部分高校和厂矿的造反派在东风广场连续举行群众大会，王延春被抓去作检讨。

中央决定把湖南省委原第一书记、时任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张平化，重新调回湖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回到长沙后的第二天，到湖南大学出席一个群众大会，他主动作了自我批评，但一讲完话，就遭到批斗，他的脖子上被挂上一块黑牌子，站在主席台上，低头弯腰。

对于这种混乱局面，华国锋很忧虑。他气愤地说：“这哪里是革命？是人身诬蔑！”他心里难过得很，几天睡不好觉。他说：“这些造反派，谁在第一线工作，他们就攻击谁。张平化没有回来之前，他们主要攻击王延春。张平化回来了，他们就攻击张平化。而中央文革这些人还认为乱得不够。”

此后，湖南省更多的领导受到批斗，各级党政机关陷入瘫痪状态。

11月中旬，华国锋忧劳交加，得了心脏病，住进了一所部队医院。当时，中央规定，部队不准介入地方的运动，所以，部队医院还算平静。可是，在医院住了二十来天，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就发表讲话，说不准地方领导干部躲到军队里去，要他们去见群众。谁都知道，见群众就是挨斗、挨批，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华国锋不愿牵连别人，就从医院出来，去了湘潭韶山灌区管理局。

造反派找不到华国锋，就将他的夫人韩芝俊拉出来游斗。华国锋只好重新回到长沙来。

华国锋回到长沙后，便过上了挨批挨斗的生活。他每天提个书包，里面装着牙刷、牙膏、毛巾和换洗的衣服，到处接受批斗，作检查。

1967年1月以后，群众组织逐步分裂为对立的两派，斗争十分激烈，许多厂矿因此停产，严重影响了生产和人民生活。

5月，一派群众组织逼迫华国锋“亮相”表态，站在他们一边。华国锋表示不“亮相”。5月9日，他与湖南省委农工部部长万达合写了一张大字报，呼吁两派群众要团结不要相斗。

这下惹火了“工联”“永向东”一派群众组织，他们认为，这是华国锋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强加在他们革命造反派头上，加到支持革命造反的革命干部头上。所以，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工联”就把华国锋和万达抓了起来，并在湖南省体育馆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判。还让他俩穿着单裤子，跪在地板上。批判会后，又把他俩秘密押送到长沙电器制造厂，关押起来。造反派怕军区知道，之后在四五十天时间里转移了六七十个地方。其间，在他们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又几次批斗华国锋。

一次，华国锋被关进一座锅炉房里，看锅炉的老师傅说：“华书记，看你头发长，批斗时容易被抓头发，给你理个发吧。”华国锋很感激。这位老师傅便给华国锋理了个小平头，第二天接受批斗时，造反派就无法抓他的头发了，华国锋便少受了一些皮肉之苦。

◇ 周恩来电话要人

1967年夏，许多地市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三湘大地一片刀光剑影，陷入“全面内战”之中。

为了制止武斗，实现安定团结局面，6月，中央决定将湖南省军区领导、两派群众组织的领导、革命干部代表召到北京开会，筹备成立“三结合”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周恩来给湖南省军区打电话，要华国锋作为革命干部代表去北京开会。周恩来先后打了两次电话，但省军区没有找到华国锋。6月14日凌晨3时，周恩来第三次拿起电话，直接找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华国锋，限期送到北京来。口气严厉，不容置疑。几经周折，广州军区终于找到华国锋，把他解救了出来。

周恩来并不认识华国锋。新中国成立后，华国锋一直在湖南工作。周恩来很少去湖南，1966年前华国锋只是到北京参加会议时听过周恩来的报告，并没有个别接触。所以，周恩来三次打电话，应是奉毛泽东之命。毛泽东一定要华国锋参加会议，是准备让他参加省革委会领导班子。

6月21日，华国锋从长沙乘机赴京。临上飞机前，“工联”要华国锋表态，支持“工联”。华国锋说，我被关押几十天，对外界情况不清楚，“不能表态”。一个姓黄的“工联”常委越俎代庖，起草了一份声明，意思是支持“工联”，盗用华国锋的名义发表了。

7月，中央解决湖南问题的会议召开。湖南省军区领导、地方干部代表和两派群众组织的领导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以正式文件通知湖南在京开会的两派代表，要他们就“不游行，不打架，不抓人，不阻碍交通，不夺枪开炮，不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等事项达成协议，签字后用电话通知各自的群众组织，保证切实执行。

鉴于湖南省军区已介入派性斗争，8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解放军第四十七军进驻长沙，并开始领导湖南全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正式宣布由第四十七军主持湖南全省“文化大革命”，决定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任命第四十七军军长黎原为组长，华国锋和中共湖南省委候补书记章伯森为副组长，强调要“坚决制止武斗，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不管哪一派，今后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

8月19日，湖南赴京开会的代表大部分返回长沙。

◇ 进入湖南省革委会，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在赴京代表回到长沙前后，湖南的武斗事件仍在不时发生。从1967年7月至8月下旬，邵阳军分区、武装部等单位的武器先后被抢，包括各种枪支818支，迫击炮27门，手榴弹1.2万多枚，子弹约2500万发。赴京开会的代表回到长沙的第二天，长沙城内便发生了持续三天的大规模武斗事件，死亡24人，伤多人，湘绣大楼被烧毁。9月4日，邵阳发生武斗，伤亡数人。

在武斗的枪炮声中，9月5日，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简称“省革筹”）宣布成立，组长黎原，副组长华国锋、章伯森。在筹备小组成立后所发《公告》中宣告：自即日起，湖南省党、政、财、文一切权力，统归省革筹。作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将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湖南省革筹成立之后，积极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稳定社会秩序，全省武斗逐渐平息。

1968年1月14日，湖南省革筹成立生产指挥部，领导全省的工农业生产，努力扭转连年下滑的经济形势。华国锋因为熟悉经济工作，被任命为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

1968年4月8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黎原任主任，龙书金任第一副主任，华国锋、杨大易、章伯森、刘顺文、胡勇、叶卫东任副主任。

1970年4月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相当于省委）成立，黎原任组长，华国锋、卜占亚、杨大易任副组长。

在这前后，毛泽东几次接见华国锋等人。

1967年9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华北、华东、华中等地视察。9月18日，毛泽东的专列到达湖南省会长沙，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湖南省革筹的情况汇报。翌日上午10时，毛泽东接见了湖南省革筹的负责人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人，并发表重要谈话。他指出：各地革命群众组织要实现大联合。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各派要相互少讲别人的缺点，别人的缺点、错误让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毛泽东还说：绝大部分干部都是好的，不好是极少数；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要武斗、打人、伤人，要扩大教育面，解放干部。

毛泽东还向华国锋等人回忆了自己1917年步行千里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的情况，并感慨地说：那时的山路很难走呀！毛泽东的记忆力很好，对当时的许多人和事都记得很清楚。

1969年6月，毛泽东再次回湖南视察。6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黎原、华国锋，听取了湖南工作的汇报，并发表谈话，指出：一个单位分成两派已经三年了，要联合起来，要教育团结多数，大多数人是好的，干部解放后，可以调换一个地方工作；即使对敌人也要区别对待，抓人多了不好处理。

毛泽东还提出湖南应10年建成工业省。当他了解到湖南煤炭生产有较快发展后，兴奋地说：要扭转北煤南运局面，发展湖南的煤炭工业。

当听说湖南澧水一带发现大盐矿，湖南省委已决定建设湘澧盐矿后，毛泽东十分高兴，连声称赞说：好！好！好！

这年的11月，毛泽东再次来湖南视察。11月12日，毛泽东听取了黎原和华国锋的汇报。毛泽东对湖南形势的发展表示满意，指出：前年来时还是急风暴雨，现在看来形势很好，以后可能还会出点什么事，但大局不会有变化了。他说：党的九大以后，要抓革命，促生产，“湖广熟，天下足”，中南各省要抓好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 推动湖南“农业学大寨”运动

华国锋在被任命为湖南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后，利用武斗逐渐平息的有利形势，按照毛泽东几次谈话的精神，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首先是农业生产。

1968年2月29日，春耕在即，在华国锋的积极推动下，省革筹、第四十七军、省军区联合发出《关于掀起春耕生产高潮的紧急动员令》，要求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生产领导班子，并规定农村生产队一般不许夺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到生产第一线去领导生产，组织生产。这一文件下发后，对稳定农村形势和及时组织春耕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常德县蔡家岗公社党委书记刘春樵，在旧社会要过5年饭，做过18年长工，是个苦大仇深的人。解放后，他当上了干部，总想多给群众办点事，于是，他总是向上级领导强调他们这个地方有多么困难，条件多么差，向上级要钱、要粮、要干部，大家称他是“三要”干部。后来，他到大寨参观，看到大寨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大干苦干，使大寨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在遭受特大自然灾害时都能做到“三不要三不少”，深受教育。回来后，他就带领全公社的干部、社员大干起来，仅用两三年时间，就使这个公社的山山水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粮食产量、集体经济收入成倍增长，由年年吃国家返销粮变为年年卖给国家大量余粮。武斗期间，他从不参加武斗。一次，一个所谓“文攻武卫”指挥部打来电话，要他带领500民兵参加武斗，他斩钉截铁地说：“要我解放台湾可以，马上去；要我参加武斗，死也不干！”后来，他“靠边站”了，便带着背包，下到水利条件很差的芭蕉堰大队，带领该大队干部群众苦干了一个冬春，修了一座水库，使1000多亩农田摆脱了干旱的威胁。

华国锋听说这个先进典型后，于1968年4月亲自来视察。后来，又在湖南全省各种会议上广泛宣传，号召全省干部向刘春樵学习。在一次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说，在农村，我们要培养一大批刘春樵式的干部，成千上万，甚至几万。有了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又团结一大批搞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我们的事业很快就会兴旺起来。

当时，一些地方不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政策，超越阶段搞“土政策”，没收党的政策许可的社员的自留地，不看客观条件盲目地合并社队，把政策规定的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也当作资本主义批判。针对这种情况，华国锋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稿），于1969年9月17日以湖南省革委会名义下发，纠正了这一倾向。

为了把农业搞上去，华国锋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领导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从1968年冬到1969年初，先后组织全省各地4万多名农村干部前往山西大寨参观学习。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华国锋发现并树立了两个先进典型，即湘南丘陵地区的新田县、湘北洞庭湖区的安乡县。新田县自然条件差，安乡县的自然条件较好，这两个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大干苦干，粮食产量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华国锋认为，这两个典型很有代表性，很有说服力，便向全省发出“学新田，学安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极大地推动了全省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和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在一次听取汇报后高兴地说：你们南有新田，北有安乡，路子走对了，各地要搞自己的大寨。毛泽东还说：大寨好，好就好在自力更生。不要去那么多人到大寨参观，人太多了成灾，你们自己搞自己的“大寨”嘛！

继新田、安乡两个县级先进典型之后，华国锋还发现和树立了龙山县洛塔公社和邵东县野鸡坪大队两个基层典型。他主持起草了全省学洛塔、学野鸡坪的决定，并召开湖南全省“农业学大寨”现场会，推广洛塔和野鸡坪的经验。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湖南省革委会农村办公室撰写的一篇文章曾指出：

当年全省有120多万人去洛塔、野鸡坪参观学习。大家看了洛塔、野鸡坪的自然条件，再看那里的干部、群众改天换地的英雄事迹，都深受鼓舞和教育。过去一些怕困难的同志都找到了自己思想上的差距。他们说：“社会主义等不来，靠不来，要用自己的双手创出来。”“要想山河变，就得流大汗。”全省一个学洛塔、学野鸡坪的群众运动迅速掀起，洛塔、野鸡坪式的社队越来越多。野鸡坪大队所在的邵东县，是一个石头多、水源缺、土质差、产量低的地方。1970年以来，认真推广野鸡坪大队的经验，向荒山乱石进军，新开田土五万二千多亩，改坡土和开荒建园九万五千多亩，同时，大搞水利建设，使旱涝保收的土地面积达80%以上，粮食产量持续上升，1973年亩产过千斤。桃源县原来是个“山多和尚头，田多望丰收，怕旱又怕涝，年年为水愁”的地方。1970年以来，以新田、安乡、洛塔、野鸡坪为榜样，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全面规划农、林、牧、副、渔，综合治理山、水、田、林、路，大干六年，面貌大变，实现了每人一亩旱涝保收农田，粮食产量连续三年跨“纲要”。

在“文革”初期，湖南省许多企业因为武斗停产。华国锋在组织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同时，还抓了湖南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在当时整个经济还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华国锋就十分重视环境保护问题，积极治理工业“三废”，造福人民。

◇ 主持修建欧阳海灌区，毛泽东给华国锋讲了有关春陵水的典故

在湖南省桂阳县春陵水上，巍然耸立着一座大型深孔溢流双曲薄拱坝。坝后，一汪平湖，映着山影林海；坝前，两条水渠穿山越岭，向东西两个方向奔腾而去，绵延1900多公里，分支90余条，流经耒阳、衡南、常宁、衡阳等市县，灌溉着湘南72万亩农田。这就是著名的欧阳海灌区。该灌区是一个以灌溉为主，同时在防洪、发电、航运等方面发挥综合效益的大型水利工程。因为该灌区的枢纽大坝位于著名舍己救人英雄欧阳海的故乡桂阳县境内，因此被命名为欧阳海灌区。

欧阳海灌区是继韶山灌区之后，华国锋主持兴建的又一大型水利工程。

欧阳海灌区的水源是春陵水，一次毛泽东来湖南视察，对华国锋讲了有关春陵水的典故。他说：在古代，有一位春陵侯，做过一些好事，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条河取名为春陵水。可见，做好事的人，是受人们尊敬的。毛泽东给华国锋讲这一典故，是勉励他要多做兴修欧阳海灌区这样的好事。

1966年11月6日，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委作出兴建欧阳海灌区的重大决定，并任命华国锋为工程总指挥部党委书记兼总指挥。

在这之前几个月，勘测、设计、论证等工作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华国锋曾亲自考察枢纽大坝坝址。

9月的一天，有关部门开会审议工程方案。华国锋当时正在生病，仍坚持参加会议。同志们看他行动不便，把图纸摆到他座椅前面的地板上让他看，他看不清，便从座椅上移坐到

地板上看。后来，他索性伏在图纸上，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查看，与人一条一条地议，直至把图纸看完。

1966年10月，欧阳海灌区工程试开工，拉开了该灌区工程建设的序幕。

关于枢纽大坝的坝型，开始设想过几种方案：一种是大头坝，一种是重力坝，一种是双曲薄拱坝。第三种方案，技术先进，经济节省，但当时国内还没有建过这种坝。国外有少数几个，但规模都不大，工程技术人员想搞，但没有把握。

华国锋主张大胆采用高新技术，支持第三种方案，最后建成了一座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第一座大型深孔溢流双曲薄拱坝，为国家节省投资300多万元、水泥1万吨、劳动工日50万个。

在施工过程中，围绕着大坝高程，也有过一场持续很久的争论。当时，一种意见是坚持按原方案建设，按130米建坝，理由是有利于灌溉、发电，符合群众愿望。另一种意见是缩小工程的规模，按125.5米以下建坝，并且将灌溉常宁县十几万亩农田的左干渠砍掉，理由是：可以减少淹没，减少移民；常宁干渠造价高，受益小。

在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时，华国锋表示，要注意从群众的利益和情绪出发，最好不修改方案。要充分利用水利资源，损失要小，效益要大。常宁靠近枢纽大坝，近田不灌没有道理。1968年7月下旬，华国锋主持召开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会议，广泛听取了各方面意见及其争论，最后作了总结性讲话，指出：按130米建坝，近期按125.5米蓄水运行，按125.5米移民。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后，再根据需要逐步提高其蓄水位，并组织移民。

华国锋的这一意见，既考虑了长远发展，又考虑了当时情况，为大家所接受。从此，长期以来的争论平息了，各方面都心情舒畅。

根据兴建韶山灌区的经验，华国锋提出，在灌区水渠沿线，要修建码头和跨渠桥。这样，仅灌区四大干渠沿线，就修建码头、跨渠桥等附属建筑物2800多处，深受群众欢迎。

1970年夏，欧阳海灌区基本建成。

8月1日，灌区通水庆祝大会在枢纽工地举行。华国锋发表了讲话，并为启闸放水剪彩。

随着闸门的开启，滚滚春陵水，顺着人工开凿的隧洞，从山那边的水库内流过这边洞口，沿着宽阔的渠道流向远方，热烈的掌声、雷鸣般的欢呼声四起，震撼山谷，经久不息。

◇ 扩建韶山毛泽东纪念地，毛泽东派人看后表示满意

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毛泽东的故乡，这里有毛泽东旧居，毛泽东家的几位烈士都在这里出生、长大，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

解放初，华国锋任湘潭县委书记，曾参观过毛泽东旧居。当时，经过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破坏，毛泽东旧居已十分破败，华国锋十分难过。为了让人们参观和学习，在华国锋主

持下，当地政府对旧居进行了简单的修缮。1961年3月，毛泽东旧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后来，由于前往参观的人越来越多，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建议下，在距毛泽东旧居约0.5公里的引凤山下又修建了“毛泽东同志革命实践活动陈列馆”。在华国锋的主持下，该馆于1964年7月1日奠基开工，仅用了100天的时间就落成了，创造了一个奇迹。开馆后，收集到了毛泽东弟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的照片。华国锋马上将照片亲自送到北京，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仔细地作了辨认，认为很可靠。他还询问了照片的来历。毛泽东很高兴，在照片的背后写了两句话：原件退还，洗一套送我。毛泽东还指示华国锋，给总理看一看。华国锋回到湖南后，对陈列馆馆长马玉卿说：“这是无价之宝，你们赶快将照片洗出来，送一套给毛主席。”不久，华国锋带着洗出来的照片再上北京，将照片亲自交给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蜂拥到韶山参观。1967年12月26日，从长沙到韶山的铁路开通，到韶山更方便了。随着参观者的大量拥来，韶山旧居和陈列馆日益显得狭小。湖南省革委会成立后，1969年决定扩建韶山革命纪念地，曾担任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负责这项工作。

韶山“毛泽东同志革命实践活动陈列馆”曾写过一篇文章，回顾这件事。文章写道：

1969年，韶山革命纪念地开始扩建，首先遇到的就是保持韶山冲内特别是毛泽东旧居附近原貌的问题。在研究建筑方案的时候，华国锋同志及时教育我们：韶山是革命纪念地，陈列馆绝不能搞高、大、洋，搞高楼大厦、富丽堂皇。建设韶山革命纪念地，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光辉诗篇《七律·到韶山》中的“喜看稻菽千重浪”的精神，保护韶山革命原貌，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注意节约的原则。为了最后确定扩建方案，1969年春，华国锋同志亲自来韶山。他不顾旅途疲劳，一下车就找韶山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听取他们的汇报。随后，徒步登上陈列馆后面的山头勘察地形。当时，有人提出，这个山窝面积小，扩建可能有困难。华国锋同志先用脚一步一步大体计算了山窝的面积，接着又亲自用皮尺仔细作了丈量，终于用事实说服了大家，说明扩建的施工面积完全够用。临走时，他还再三强调，韶山的一草一木，都要注意保护，并指着山上树木叮嘱说：这东边的树要保留，西边的树也要保留，几棵大松树尤其不能动。后来，我们执行了华国锋同志制定的方案，群众反映很好，都说，幸亏华国锋同志及时指导，才使我们在陈列馆的建设上，体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意愿，保留了韶山的革命原貌。

韶山陈列馆扩建完成，陈列品也布置好后，毛泽东派人来看，表示满意。一些外国朋友也赞不绝口地说：韶山革命圣地的建设，搞得好，朴素大方。

□ 《党史博览》 2015年第2期

~~~~~

## 【百家争鸣】

毛泽东究竟何时提出“刘邓可以分开”

• 窦应泰 •

阅读《党史博览》2014年第9期，见有《毛泽东何时提出“刘邓可以分开”》。该文原是对笔者2014年2月发表的《“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所提的批评。该文问



道：“毛泽东提出‘刘邓可以分开’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为什么不可思议？”从该文所述，方知该文作者近年才见到毛泽东“文革”中的上述指示。因《毛泽东年谱（1949—1976）》是2013年12月才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而拙文引证的则是十年前出版的历史文献，两者其实并不矛盾。至于该文称早在1967年10月9日就见到的毛泽东批示，它与4个月前毛泽东对汪东兴的指示全然不同。请注意，笔者记述的是“首次提出”，至于说10月9日毛泽东删除邓小平名字的批示，时间滞后了数月，这还能算首次吗？

#### ◇ 邓小平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仍分管一线工作没有史实依据

笔者认为，毛泽东1967年5月提出“刘邓可以分开”，其意在将来处理刘少奇、邓小平问题时可分别轻重，而非从那时起即可薄刘而厚邓。不然，毛泽东就不会支持全国范围内掀起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运动，也不会拖至1973年3月才解放邓小平。该文用大量篇幅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在中央再没有做过任何工作”，“在这点上，邓小平和刘少奇是不同的”等。该文还说，十一中全会后“邓小平还分管中央调查部、中央联络部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专案审查委员会”，言之凿凿地说“这就是把‘刘邓分开’的一个具体表现”。

事实真像该文所说的那样吗？莫非毛泽东1966年8月就决定把“刘邓分开”了吗？众所周知，“文革”伊始，国宾寥寥。毛泽东难道会下令禁止刘少奇接见外宾，却允许邓小平出来会见外宾？难道毛泽东不准刘少奇去“分管任何具体工作”，却让邓小平分管中央调查部和中央联络部，甚至在当年8月以后，还允许邓小平继续领导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现有大量史实表明，1966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排名发生改变后，他和刘少奇同样陷入了不能工作的状态。

据邓小平女儿邓榕回忆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原来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此次会议后，实际上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工作”。邓榕称：“此时，父亲和刘少奇一样，已完全不参加工作和任何会议，只是整日在家看一些送来的文件。当然，这些文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内容上来说，都已不能和往日相比。”邓榕又说：“毛泽东批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但到了这时，他还没有下决心将刘少奇和邓小平，像彭、罗、陆、杨一样彻底地打倒。”

在谈到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及邓小平是否领导某部的工作时，邓榕十分明确地表示，“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决定，由林彪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会后，父亲被迫停止了工作。他将一部分原来由他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工作交给康生，说：‘我的工作交给你，我不能工作了。’”

由此可见，该文所谓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因毛泽东想把“刘邓分开”，从而让邓小平还分管中央调查部和中央联络部，甚至还领导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等说法，显然是没有史实依据的。

#### ◇ 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谈话及中南海批斗，与何时提出“刘邓可以分开”没有关系

该文一面说“从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7年5月，毛泽东与刘少奇有过这样一次谈话吗？没有，完全没有”，否认毛泽东“文革”中与刘少奇有任何接触，一面又不得不承认1967年1月13日夜，毛泽东曾请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过一次”。而且，该文弄错了毛泽东和邓小平谈话系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谈话之后（1967年5月后），因而用毛泽东与刘少奇“有过这样一次谈话吗”进行比较是毫无道理的。

至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究竟谈了些什么，除刘少奇家人事后透露的信息外，毛泽东和刘少奇生前遗稿对此次谈话均无详细记载。因此，仅凭现今流传的点滴信息，就断定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谈话不及与邓小平的谈话诚恳，显然没有事实根据。

仅依刘少奇子女刘源、刘平平和刘亭亭在《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中披露的情节，就不能简单评价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谈话缺乏诚意。1967年1月13日夜，毛泽东与刘少奇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非常关切地询问：“平平的腿好了吗？”刘少奇则笑答：“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两人谈话之中，毛泽东还向刘少奇建议要他读几本书，如狄德罗的《机器人》和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等等，且两人分手时毛泽东又把刘少奇礼送门前，再次叮嘱他：“保重身体。”正因毛泽东的诚恳，刘少奇回家后才对等候消息的妻儿欣喜地表示：“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叮嘱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从这些刘家人披露的细节中，丝毫看不出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的谈话有什么区别。

依现有史料进行研判，毛泽东的确在“文革”中分别找刘少奇、邓小平谈过话，且每人谈一次，可谓不偏不倚，不厚不薄，一律以党内同志相待，属于同志式交换意见。从目前披露的资料看，还说明不了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两人的亲疏。要知道毛泽东分别与刘少奇、邓小平谈话的时候，“刘邓可以分开”的决定尚未正式提出。如此重要决策，毛泽东当时或许正在思考酝酿之中。至于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两人究竟谈了些什么，目前尚未见披露详情的正式文件，故对上述历史性谈话凭主观臆断所作的猜测，都是有失严肃的。

该文称中南海造反派批斗邓小平系以陈伯达改动中央办公厅的报告为肇因，其实这也并非邓小平遭受批斗的全部。事实上，早在1967年8月5日中南海出现规模最大的揪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行动之前，邓小平已遭到一次造反派的批斗和抄家。

戚本禹收到中央办公厅关于批斗刘少奇的报告也非该文所说的8月，中央办公厅的报告早在7月15日就呈送给中央文革。只不过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同时被批斗则集中在8月5日这一天。其原因在于当日恰好是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周年。中南海造反派要举行庆祝活动，这才突然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采取行动，并在三个不同场合进行批斗。

此事与毛泽东提出的“刘邓可以分开”更是互不沾边。因为早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遭到联合批斗的数日前，7月19日，邓小平即遭造反派批斗和抄家。7月29日，邓小平又被中南海造反派以召开支部会为名从家中骗走，在一座小院里被批斗了一次。

至于8月5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被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成纪录片，试映后被人下令销毁一事，如确有证据是毛泽东从外地发来的指示，也不能据此证明与毛泽东刻意保护邓小平有关。因为一并销毁的乃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人遭受批斗的影像资料，而非邓小平一人的。对此事的解释只有一个：毛泽东反对中南海造反派以如此粗暴的行为对待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 毛泽东提出“刘邓可以分开”的时间只有一个

毛泽东究竟是不是1967年5月首次提出“刘邓可以分开”的？如若不是，毛泽东首次提出此议又是何年何月？

笔者引证毛泽东“刘邓可以分开”的指示，出自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的由邓榕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见第44页）。邓榕作为历史见证者所披露的邓小平“文革”内幕，应该是最有价值的。她说：到了（1967年）5月，一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到我家，找父亲谈话。汪东兴对邓小平说，主席最近刚回到北京，让我来看看你。毛泽东让汪东兴向邓小平转达他的三个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据此研判，这是披露毛泽东三点意见最为权威的版本，也是最早的版本之一。

毋庸置疑，毛泽东让汪东兴向邓小平转达的三点意见中，“刘邓可以分开”无疑是第一次提出，也就是拙文所称的首次。

□ 《党史博览》2015年第3期

~~~~~

# 【亲身经历】

## 我参与处理“揪刘火线”

• 华方治 •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刘少奇同志被“一张大字报”打倒后，继续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在全国规模的所谓“批刘”运动中，北京刮起了一阵小小的旋风——中南海外围的所谓“揪刘火线”。我因工作关系，知道此事件的全过程。

◇ 事情的缘起

1967年春，在“全国大串联”之后，提出所谓“就地斗批改”。

五月的一天，中南海北门警卫报告：“有建工学院的四五十个学生要见中央领导，要求将刘少奇揪回建工学院接受革命师生的批判。”按照分工，由我前去处理。我赶到北门，先让他们选派代表并让他们的队伍离开大门，以维持大门的秩序，他们都照办了，我和他们的代表到北京图书馆前谈。他们的主要负责人是个个头高高的女学生，她先谈了他们的要求，我根据当时对此类事处理的口径做了答复：“中南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办公的地方，为了确保安全，不宜很多人在此集结和停留，中央号召‘就地闹革命’，‘就地斗批改’，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写成书面材料，我们负责转呈，你们回单位等候答复。”

经做工作，他们很快将队伍拉走了。过了几天，又有建工学院的学生来到中南海西门提出同样的问题，我去做工作，说服不了他们。后来知道，他们是“新八一”，即当时所谓“造反精神”强的组织。反复说服不听，我们就采取冷处理，听其自便。那时府右街道路没大修，中南海西门至西北门分上下道，中间有一小岛，他们便在岛上搭了帐篷住在那里。

7月10日，据西门警卫报告，当天戚本禹坐车从西门出来，绕着小岛转了一圈下车问学生：“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学生答：“建工学院‘新八一’。”

问：“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学生答：“把刘少奇揪到学院接受广大师生的批判！”

戚说：“你们在这儿多辛苦啊，你们还是回学校去，不一定把刘少奇揪到学院去，可以搞背靠背的批判嘛，让刘少奇写个书面检查给你们还不行？”

学生说：“行！”

这时学生很激动地呼喊起口号：“感谢中央文革对‘新八一’的关怀！”“感谢戚本禹同志！”

戚说：“你们的要求我会向中央文革反映，让刘少奇写个书面检查。”说完，他乘车离去，我去找秘书局接待组组长孙吉太同志，他说中央已定，“让刘少奇给建工学院写个书面检查。”

我听对孙说：“材料写好一定不要交给一个组织，中央号召大联合，一定让他们派出联合代表来接，否则，一个个都来要‘检查’，你应付不了。”孙说：“对，一定让他们联合接。”

过了几天，是个星期日早晨，我骑车出中南海西门去铁道学院，走到西门北边一看，不好了，担心的事还是出现了，大墙贴满了“感谢中央文革对建工学院革命组织‘新八一’的关怀！把刘贼的认罪书交给革命组织建工‘新八一’”，在按语后面是刘少奇检查的全文，府右街北口贴着，西安门大街贴着，平安里贴着，西直门贴着。按语突出强调了中央文革交给“新八一”，交给“革命组织”，这是挑起矛盾的关键因素。

从铁道学院回来，我直奔秘书局接待组找孙吉太，见孙后我说：“糟了！老孙，‘新八一’已经把刘少奇的检查贴满了全城；这样，建工学院的其他组织肯定会来要刘的‘检查’。一个月前，建工‘老八一’到北门来，被我劝说走了。”孙此时也感到事情麻烦了，他说：“自戚本禹见了‘新八一’后，‘新八一’他们每天几次打听刘的‘检查’写好了没有，当我们拿到刘的‘检查’后，他们要求看看，说他们在这儿坚持了一个多月，多么辛苦啊，还不让先看看。我说必须他们学院联合派代表来拿才能给他们，他们保证只是看看，不想他们还是抄写去了。”

正如所料，7月13日建工学院“老八一”带着愤怒的情绪涌向中南海西门。我接到报告，迅速赶到西门，按以往的方式向他们做工作，这次不灵了，他们根本不听任何劝说，他们说：“上次听了你的话，我们回去了，他们‘新八一’不听你们的话，在中南海待了一个多月，结果你们把刘少奇的‘检查’交给他们，这是什么道理？”又说：“这次，我们要采取最革命的行动，不把刘少奇揪出来，决不收兵！”这时有20多个青年学生到大门北侧墙根坐着，他们宣布：“从现在起，进行‘绝食’。”

开始坐着，后来逐渐开始躺倒了。此时，看热闹的、“支援”的越来越多，有的不是建工学院的也加入了绝食的行列，陆续地，有的打着旗子的单位也来“支援”，“老八一”的人继续增加，有的绝食，有的演讲，讲他们绝食的原因，讲他们绝食的决心，吁请一切革命的人们支援他们的“革命行动”。

这时天渐渐地黑了，中南海西门外已是人山人海，绝食者开始有出现昏迷的；北大医院的医务人员前来救护。后来，绝食人员增多，救护人员显得不够，别的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来

了，绝食者在继续增加，昏迷者被陆续送走，救护车的警笛声不断，有组织的、“看热闹”的也在猛增，府右街交通受阻，已成了人的海洋。

#### ◇ 遂成高潮

府右街的事件，没有官方的传媒工具，仅靠一张嘴或者加上有线电话，就在一夜之间传遍京城和北京附近的城市和省份。绝食的没有了，都送到医院去了，但有组织和无组织的人却蜂拥而来，都以能到西门外占有一席之地“为荣”；有的搭起了帐篷，插起了本单位的旗子，张贴大字横幅“××揪刘火线联络站”“××揪刘火线指挥部”……大刷标语，各组织传单、小报，到处分发，到处传递；通过串联，成立了“揪刘火线联络站”，推举了头头，有的把本单位本组织本系统的批斗对象揪到现场批斗。据我所记有：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北大工作组成员彭珮云，安徽省第一书记李葆华，八机部党组书记黎玉，纺织部部长钱之光，还有桃园村原支书吴×，他是来控诉王光美在桃园搞“假四清”对他的“迫害”；纺织部机关的造反派把钱之光揪到中南海西北门外，挂一张大芦席，贴上“纺织系统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钱之光”，钱之光倒写着，还打上红叉，钱之光被太阳强光暴晒着站在大标语下示众。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和秘书局接待组从海军借调来的老刘商量，劝说他们不要这样搞，这样影响不好。老刘同志和我的看法相同，他也认为不好。于是我们就去找纺织部造反派的头头，一个四十来岁，身体较胖、干部模样的男人接待了我们，老刘首先介绍了我们是警卫部队和中办秘书局的人，并讲了对他们做法的意见，希望他们不要这样搞，这样影响不好。他听了我们的意见后很不高兴，说：“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你们好好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看来我们对毛主席的著作没有他学得好，不过他学了是为了取其所需，对付别人。

增援“火线”的队伍在继续增加，不仅仅是北京范围，北京周边的天津、唐山、承德、张家口、保定、石家庄等城市都有群众组织来，就连山东、辽宁等省也有。当时统计，大大小小的组织1000余个，帐篷搭满了府右街两侧，就连灵境胡同、枣林大院等周围的胡同里都搭上了帐篷，有的一个帐篷几个单位。一片帐篷的世界，人的海洋。

“火线”不仅组织多、人数多，“火力”也在不断增强，开始少数单位装了广播喇叭，后来没装的单位也效仿起来，把最大的喇叭都拿了出来。据统计，最多时达600多个高音喇叭，一齐开动起来，中南海机关被吵得根本无法办公、休息，连中南海周围的居民都无法生活休息。你还不能提意见，因为他们是“革命行动”，谁敢反对“革命行动”？

高音喇叭就在周总理墙外高叫，吵得总理和邓大姐无法办公、休息，工作人员劝总理暂时换个地方，总理不同意，说：“他们就是对着我来的。”的确是对着周总理来的。就在闹得乱哄哄的当口，从府右街通过的14路汽车撒下的传单上写着：“（大意）中央的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被彻底摧垮了，但是旧的政府依然没动，他前几天还在保那个司令部里的第二号人物。”署名是“5·16红卫兵团”，此传单当时已上缴领导机关。

根据群众向我们报告的情况，“火线”策划组织人员要冲进中南海，架走刘少奇，他们做了精细的研究部署，冲门的分几个梯队，直接揪刘少奇的，还准备了几辆小汽车。据说，有一个曾在中南海施工部队任职的干部向他们提供了刘少奇住处的方位图。我们将此情况报告给中央负责同志，随后得到指示：“一定不能让他们把刘少奇揪走。”部队做了充分的准备和部署。

在此期间，部队进行了一些宣传和爱民的活动，增强军民关系，派出了宣传员向各组织宣传毛泽东思想，具体就是宣传群众“大联合”，“就地斗批改”，“就地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同时掌握群众组织的动态，如：要冲进中南海揪刘少奇的行动，就是群众主动向我们反映的。中南海的警卫部队还为群众送开水，派医生为生病的群众看病送药，这些行动都直接为保卫中南海的安全起到了作用。

#### ◇ 狼狈地撤离

据说，毛主席大江南北巡视回京后，对围困中南海的行动提出了批评。8月4日突然接到通知，中央文革要在西门给群众讲话，于是连忙准备了大卡车，我记得陈伯达、谢富治、叶群等在西门下了车，又踩着凳子上卡车。陈伯达讲话，大意是：伟大领袖号召大家要“大联合”，“要就地闹革命”，“就地斗批改”，要立即统统撤离中南海，一个也不留；谢富治也讲了话，说：不要揪刘少奇了，中央安排在中南海里分三个会场，由中南海群众组织分别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批斗的过程拍成纪录片放给大家看。大家从现在起，马上撤离中南海，越快越好。散会后很多单位在拆帐篷回家。陈伯达、谢富治一直在监督撤离行动，深夜了，还在检查督促，当看到有的行动迟缓，想等到明天再撤的单位时，陈伯达火了，气哼哼地说：“我们搞过武装斗争，搞过土改，搞过多种形式的革命，什么时候像你们这样搞过？你们这不是在搞革命行动。”还骂他们是在“丑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在“给文化大革命抹黑”。

在这种气氛下，帐篷很快被拆除搬走了。轰动全国的极“左”闹剧——围困中南海长达近一个月的“揪刘火线”，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一顿训斥而告终了。

□ 原载《炎黄春秋》 2015年4期

~~~~~

#### 【往事非烟】

#### 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与反思（下）

• 阎 淮 •

（上接 zk1505c）

### 三、云贵保省委 回京反文革

#### 1、“敢死纵队”大战云贵

66年9月初，我和同系的徐沙等9位干部子女，打着“清华大学红卫兵南下敢死纵队”的旗号，赴云贵保卫其省委。选择那里的原因是，我的铁哥们徐沙的父亲（原二野干部）解放初曾在那里任省领导。

我们到达云南后，立即与省委书记阎红彦上将、昆明军区司令秦基伟中将取得联系。云南支持省委的群众拟成立全省的红卫兵司令部，反击北京和当地造反派的“反动行径”，阎和秦请我们协助筹备。九月中旬，在昆明人民广场召开数万红卫兵参加的“红司”成立暨保卫省委誓师大会，党政军要员讲话支持。宣读“红司”宣言的是省公安厅之女王海燕。我在大会上介绍了“八一八”在天安门上毛主席接见我们清华红卫兵50人的盛况，以及《人民日报》支持我们“八二四”壮举等清华红卫兵“过五关斩六将”的战绩。会后保守势力大

振，省委和军区在保守派红卫兵的支持下，基本控制了形势。我们“敢死队”首战告捷，随即转战省委告急的贵州。

贵州有两个特殊情况。一是，省委书记贾启允 65 年 4 月刚上任一年多。陶铸指示：“贵州省委是四清后的新省委，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信任，我们当然要保！二是，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 9 月起连发数封信，反对省委、支持造反派，被中央文革重视。李是 1955 年的上校，60 年升大校。我认为，级别高低标志着对革命贡献的大小。区区一个校级军官竟敢反对中央四号陶铸肯定的省级党委，我们跟你死磕啦！

66 年 9 月下旬，在贵州省委大楼的两侧，出现北京南下红卫兵的两个据点——北京“三司”几百人炮轰省委的指挥部，我们“敢死纵队”九人保卫省委的办公室。当地百姓诧异：北京到各地的红卫兵都是造反的，怎么你们是“老保”？起初，我们人少势大，在各高校联络，并使广大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团结在“敢死队”周围，使贵阳成为保守派的天下。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中央明确支持李再含和造反派，我们失势了。当初大张旗鼓进驻贵州，半个月后偃旗息鼓溜出贵阳。

新华社记者肖健卿在《贵州文史》2010 年第二期《贵州“文革”初期琐记》中写道：“据说，大约在 9 月间，一位副省长的儿子，从北京一大学组成一个小分队，在贵阳各高校串连，大肆宣扬省委的业绩，特别说明贵州山地居多，少数民族比例较大，能取得目前的成就十分不易。为了活动方便，省委领导还向小分队，优厚地提供了活动经费和场所，提供了宣传车辆。北京小分队不负父辈的希望，活动也很有成绩。不久，‘省委会——没问题，大方向——正确的’口号，就呼喊出来，在全市大街小巷贴出了醒目的标语。随后，贵阳的造反组织奋起反抗，用大字报揭露这个北京小分队的内幕，并针锋相对地呼喊出‘省委会——有问题，大方向——错误的’口号。”

此文基本属实，只是肖记者暗指的副省长陈璞如（文革后任铁道部长）之子，中国科大的陈金城与“敢死队”活动无关，陈只在我们回京后，表示感谢；在我们倒霉时，表示歉意而已。

1967 年初，中央文革和公安部镇压了中学保守派红卫兵组织“联动”后，在北京八一学校举办了《联动罪行展览》。“贵阳敢死纵队”被列为“高校联动”，图文并茂地被展览示众，并注明“革命干部的杰出代表”李再含向中央汇报时，点了“敢死队”的名。清华造反派说，“你们被永远地、无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10 月 1 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社论，首次提出“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明确支持“少数派”，各大中学校掌权的“多数派”红卫兵（亦称“老兵”）顿时感到被中央抛弃。我如五雷轰顶浑身“拔凉”、痛苦知晓大势已去。（这也是“敢死纵队”在贵州惨败的大背景。）

10 月中旬我回到北京，清华已是蒯大富的天下，我们红卫兵已名存实亡。在云贵和北京惨遭滑铁卢后，我对中央文革极度不满，对文化革命彻底失望。原来认为运动是对着少数有问题的干部，现在感觉不对了，文革是要整垮全部干部队伍，我们是螳臂挡车无力回天。

脱离城市无聊的造反与保守，深入农村了解农民，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此想法在清华无人响应，我找了三位天真的北京 101 中的同学。我们计划从南向北、从富向穷走遍中国农村。11 月初，坐火车到广州后，背着一二十斤生活用品、步行七十八里，来到番禺县乡村。我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了一个月，两个党员、两个复员军官（65 年

哈军工归地方），四个干部子弟吃了大苦、耐了大劳、受了大罪、长了大进。当我们回到广州，准备转战湖南时，听说清华红卫兵在北京炮打中央文革。消沉的革命（反革命？）意识顿时被激发，我不能缺席，应该立即返回北京、投入战斗！

## 2、与陈元和宋克荒反中央文革

12月中旬我回到清华，反对中央文革的浪潮，史称“十二月黑风”已被压制。留在学校的“老兵”头头，大多卷入后被整肃，清华红卫兵遭遇灭顶之灾。

上文提到的《检查》中，我写道：“12月下旬，我和没有卷入‘黑风’的红卫兵总部委员高晓红、张某等，及我系低班的干部子弟接触过，想重新把清华红卫兵拉起来，与蒯大富继续斗，好好干一场。”我用主席诗词安慰“黑风”后被迫检讨的、被江青点名的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等朋友：“花落自有花开时，蓄芳待来年！”

1967年，我们蓄芳的来年到了！

“1月6日下午，我和没赶上‘黑风’的朋友，陈元、宋克荒到了徐沙家，商量何去何从，四人谈起形势，感情相投又有许多看法，不吐不快，就商量写张大字报。晚饭后四个人分别起草，写完后讨论，认为陈元和我的较好。宋和徐睡觉，我和陈把两人的草稿合并理顺。清晨，徐沙睡醒后，说他清醒了，不同意写这张大字报，要闯祸的要倒霉的！我们三人坚持写，并决定署名‘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之义、又指共产党。）有三重含义：一、我们三人是多数，徐是少数；二、当时我们保守派统称多数派，造反派是少数派；三、我和宋是党员，并以此为荣。我们拿底稿到学校，请人抄好，陈、宋和我三人当众贴到大礼堂前。当时可能是7日中午。”（引自67年3月我的《检查》）

在大字报中，我们从运动形势、公安部抓人、两派组织、揪黑风后台、批评中央文革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对当时运动全面否定的看法。最反动的是：“中央文革有许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应该批评。中央文革只是中央文革，毛主席才是毛主席！”我们还点名批判了锋头正旺的中央文革成员关锋和戚本禹的几个讲话。

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的“小报”，以阶级斗争新动向，报道陈宋阎三人于7日贴出反动大字报。说“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布尔什维克’贴大字报，攻击中央文革，为十二月黑风翻案。”。（《清华文革亲历》，P98）

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后，有几篇支持的，以及更多的反击和批判的大字报。当时造反派内斗激烈，没有精力过多地关注我们，几天后“布尔什维克”引起的波澜，风平浪静了。

1月中旬，我们在清华没戏演、没戏看了，于是找了去昆明的火车票，开始了两个月的滇浙苏三省、逍遥派的游山玩水不串联。在昆明附近玩够后，因得不到东进的车票，曾滞留在春城。通过关系我们进驻“停业”的民盟“省党部”赋闲。友党欢迎我们——有北京的老红卫兵看门护院，当地的小红卫兵不便骚扰。其间我对三个朋友更加了解。陈元整天在图书室阅读马恩和列宁选集，闲暇时向我们宣讲心得。宋克荒用自己的相机钻研摄影技术和艺术，并拿我们开练。徐沙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唱机和唱片尽情欣赏古典音乐，还教导我们如何听懂交响乐。既无艺术细胞、动手能力又差，宋和徐无法让我开窍，我就只能陪太子读书、和陈元寒窗苦读马列了。陈启蒙我，让我学习原来一窍不通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来源：德国古典哲学，是我当时最大的收获。我们研读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其《开讲辞》说：“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



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黑格尔一逗（号）到底的长句令人震撼，涤荡我的灵魂。我和陈元不断背诵给宋和徐听，尽管经常遭到嘲笑。（下半年，我和陈又研读了黑格尔的《小逻辑》，使我的精神再次升华。）

2月底，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联，学生必须回校闹革命。我们3月初回到清华，噩运等着我。

### 3、被造反派专政抄家

“3月16日，清华井冈山总部发表政策声明，说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教育八九派，打击反革命逆流。号召造反派杀回各班去，展开楼道战、宿舍战，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八九反动思潮。造反派在许多班级组织了对铁杆八九同学的批判和斗争，强迫他们做检查。”（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P86，时代艺术出版社，香港，2004年）

在清华的“三月镇反”中，我这个工物系“八九红卫兵”的一把手，又写过“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报，理所当然地成了系里第一号反革命，被专政了。具体待遇是：

- 1、行动受限制，不得擅自离校，校内不许与“八九派”接触。
- 2、全校批斗反毛主席的反革命的万人大会，我被押解到台上陪斗。
- 3、系里开了若干次我的批斗会。（校系批斗会和单独逼供信，我只被按头、并未挨打，即只触及灵魂、不触及皮肉。否则肉体受不了，灵魂就出窍——我肯定胡说八道乱供乱咬，早节不保。真心感谢文明的造反派同学！）
- 4、两个同学到我家抄了我的房间，搜走我的日记笔记等物品。（当时父母还未倒霉，子弟先于干部被抄家，是为干部子弟中的特例。）
- 5、被迫书写数份、共二万余字的检查小字报，张贴于系里。（这是我文革中仅存的宝贵资料，上文曾引述，也要更诚挚地感谢造反派。）
- 6、禁止参加批斗王光美的大会。4月10日，清华召开30万人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大黑帮彭真、陆定一、罗瑞卿、薄一波陪斗。我这个小反革命不够陪斗的资格，但又怕我这个保皇派破坏，当然不能让我去现场，可是谁也不愿意留在宿舍看我，失去千载难逢看热闹的大好机会。于是，4月9日，两人押送我到校门递解出境，勒令我11日晨不早不晚准时回校报到。

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殊不知“放鬼容易、收鬼更难”。我才不回校呢！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是：“生命没危险，爱情未来到，只为自由故，二者无可抛！”失去自由了一个月，我要在家里自由自在地享受自由主义的生活。当时的三里河、现在的“中央行政区”，十几个部委所在地，老红卫兵的天下，看谁敢来物资部大院抓我？

4月14日，巨大喜讯传来，不是伟大领袖又发表“最新最高指示”，而是清华“四一四”成立，井冈山分裂为“团派”和“四派”。当权造反派的分裂，无疑是被压保守派的福音。“镇反”无疾而终，反革命的我、自我平反自动解放了！如果说，对“专我政”的造反派的感谢是事后认识的“马后炮”；那么对“四一四”的感恩戴德则是彼时的“当头炮”，当时真想放炮竹庆祝。

### 四、社会调查与博览众书

## 1、四市调查与结交刘泽彭

67年5月6日，四川成都造反派和保守派大规模武斗，死数十人、伤数千人，全国震惊。随后，两派众多人马来到中央公关，关于此次武斗的经过和责任众说纷纭。陈元、宋克荒和我决定去实地调查武斗真相。多才多艺的孙巨（无线电系、李井泉三子过继给三机部长孙志远）为我们用圆萝卜刻制了井冈山红卫兵的“印章”（我称是公刻私章）、用长条肥皂印制了井冈山的介绍信。我们通过来京的保守派得到火车票，与自控系雷同学去成都，住在他家。（大串联已结束，无“红卫兵接待站”提供食宿。）

在成都详细调查“五六事件”的来龙去脉后，我们认识到：在伟大领袖宠信的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对文革不满的军队支持保守派的地区，战斗（不只武斗）和死伤不可避免，保守派必将惨败。我们忧心忡忡，又无力回天，只能攀峨眉以散心。在山中各寺庙留下的借条，宋克荒分别署名清华蒯老富或蒯少富。游览之事不值一提，值得记录的是，在山上我们遇到自动控制系的老友刘菊芬和刘泽彭。下山后，刘泽彭加入我们的队伍，他文笔上乘，中干子弟，父亲早亡。于是布尔什维克的“三家村”变成“四人帮”，我们四人的友谊持续数十年至今（并未因我反对“风波”出走而中止）。在校期间几乎天天见面，毕业后年年春节回京探亲都要聚会。文革后，刘先任克荒之父、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秘书，后官至中组部副部长，外界戏称是主管党务的陈云义子。我被陈元劝到中组部后，是宋父的部属，刘的同事。我们四人的生活轨迹就这样交错缠绕。

6月，在成都郊县调查完毕。他们三人担心“走资派”父母和“狗崽子”弟妹的处境（我们四人皆为长子），要直接回京。我认为再次免费外出机会渺茫，应该充分利用现在的地理优势，沿铁路线继续调查，于是我孤身一人在西安、郑州、保定三个省会考察文革了解社会。陕豫冀三省激进造反派和温和造反派的对立都很严重，零星武斗不断，但是还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激烈战斗。凭借信用度较高的清华学生证（孤家寡人不敢再用“井冈山”印信），我在两派的驻地和阵地穿梭。为了取得信任便于了解情况，我不时违心地分别表示同情和支持双方对立的观点。实地调查后，我为他们的真诚而悲哀，更为他们的安危而担忧！文革半年后，因为广大干部和我们保守派的境遇而怀疑文革。一年后，因为我们同代青年、他们造反派的伤亡而否定文革。

陕豫冀，既无中学同学在读高校，又无大学同学在此居家，父母战友也都自身难保。我无处投靠，只能住店。前面已交代：大学期间家长每月发我20元“学资”，交饭费15，还剩零花5元，算是“富农”。文革后经常在家蹭吃蹭喝，小有积蓄，升级“小地主”。但是正如葛优所言：“地主家也没余粮啊！”我小地主进城也不能天天住大店呀。在三省会，我住过大车店、睡过大通铺，在候车室半坐半躺熬过几宿。在那里结识了三教九流，接触了社会底层，尽管没有看过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怎样水深火热，但我见识了中国三分之二的百姓“水火”如何。我第一次听说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当学徒、初中毕业上技校的情况比比皆是（我原以为那是些学习差的笨孩子）。老舍的《四世同堂》在这里是四世同“室”，我走进贫民窟、懂得了“平方米”的概念。（干群官民天壤之别，我们兄妹四人住校，平时家中只有父母和保姆，四室一厅一百多平的局长单元。更别提北京哥们家的部长四合院，云贵朋友家的省长小洋楼。）

在郑州火车站附近浴室的“一夜情”至今难忘。请勿翩翩联想，当时没有平民的“性服务”，只要“平民性”的服务——浴室晚上结束洗浴业务后，花两毛钱可在温热混浊的浴池中舒舒服服泡个澡，再在2尺乘5尺的小床上香香美美睡个觉。在不能洗澡的小店住几晚后，浴室就是天堂。那天正在天堂的琼浆中尽情享受，身旁的两青年搭讪。一番亲切交谈

后，首都大学生和河南游民有了点情——感情和交情。次日，白天我随新朋友整天行乞、偶尔行窃。他们高超的顺手牵羊，我毫无察觉。事后他们向我炫耀战利品，我劝戒：勿因小失大，砸饭碗进局子。他们答：警察忙于大革命，无暇小治安。晚上，按约定我管饭（打卤面），他们管睡。晚餐后，我把随身的辎重（换洗衣物及雨衣）和细软（十几元巨款及手表）花5分钱存在车站“物品寄存处”，跟他们登高而睡。——是年五一，蒯大富请来全国第一个林副主席的“四个伟大”题词，在被我们推倒的清华二校门处，敬立了全国第一座领袖看门塑像。郑州也学清华、赶时髦，在火车站前搭了十几米高的脚手架，白天忙活、黑夜安静。攀上约20米乘5米的平台，我把塑料凉鞋枕在头下，平躺在比浴室的小床宽阔无比的高大木床上，空气也格外清新。在初夏习习凉风中，“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笑声，我们躺在高高的统帅旁边，听朋友讲那过去的事情。”丐友们的经历让我大开眼界。当晚经引荐，我结识了几位“老大”，第三日我随不同的老大到不同的地盘实习。晚饭，老大们非要宴请“状元”，我受之有愧地吃了。餐后，同样夜宿高台，别样的是，他们坚持要“听我讲现在的事情”。无奈，吃人家“嘴长”！我神侃京城内外文革有意思和没意思的故事。（不好意思——这伙乞丐，比列位看官早半个世纪先听到上文诸事。）两天三夜情之后，浴室邂逅的二位，执意赠送我5分钱的站台票，依依不舍送我上北去的列车。当互道再见时，我们都知晓：再见——不到了！清华大学只教了我两年有限的理论基础课，社会大学却教我无限的人生专业课，在众多的导师中，这些丐友在时间序列上无疑位列前茅。这些课程使我增强了“平民意识”，在干部子弟中更显异类。

## 2、博览众书文体并举

1967年6月，中央紧急指示：所有人员立即回本单位参加文革。而当时清华的文革就是造反派的内斗，我不感兴趣、也不敢兴趣。7月至12月，我在清华园里度过半年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生活。

文革初，四川某气矿炸爆，一片火海。32111钻井队殊死搏斗，6人牺牲21人烧伤，扑灭大火保住了气井，名噪一时被誉为“英雄的32111”。回答朋友询问，我说正享受清华32111的幸福生活，三饱二倒一书一泳一棋牌。即是：“三餐吃饱吃好，午觉夜觉不少；晨读书暮游泳，晚上围棋桥牌学会了！”

吃——无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即许多产业工人只抓革命不促生产、甚至抓革命促武斗破坏生产时，清华的大师傅一天、不！是一顿也没停饭，让我们这些既不革命又不学习的“小资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顿顿吃好。我不敢说大师傅伟大光荣正确，但他们真敬业！

睡——幼儿园和中小学基本住校坚持午睡，清华也提倡午睡。当时“毛著”没人天天读，午睡倒是“雷打不动”，“工管”后则大翻个颠倒乾坤、只读不睡了。前些年冬季回国，北京规定供暖16度即达标，冻得够呛。遥想当年清华温暖的冬夜，真感谢只拿三四十元的锅炉工。

玩——夏秋季，“布尔什维克”的“四人帮”陈元、宋克荒、刘泽彭和我，偶尔捎上“孟什维克”的徐沙，每天午睡后到不要钱的颐和园去游没人管的野游。而后，在风景宜人的万寿山下昆明湖畔，交换读书心得、探讨时局形势，肆意褒贬毛林周及所有文革升迁者。我还篡改了毛诗《和柳亚子》：牢骚太盛利健康，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大会堂（或“南书房”）。

文革前喝过一勺心灵鸡汤：“吃和睡是猪的生活，难道加上玩就是人的生活吗？”清华学子当然不甘于“吃睡玩”的低级人生活，于是我们还读书。班上同学说：“我现在不要四

大自由（毛文革恩赐、后被邓没收的，大鸣大放辩论大字报）只要四大名著。”他钻研的还真有成效，列出《红楼梦》主要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图表，让初读者一目了然。又有后继者为三国诸将领和水浒108人列出小传，作为辅导资料油印分发。

7月16日中央文革接见学生领袖，蒯大富说：“清华有90%是逍遥派，没事干、大字报也不贴，从空想主义跌到悲观主义。”（《清华文革亲历》，P224）文革仅一年，我们“吃睡玩读派”是绝大多数，紧跟老人家“继续革命”的蒯式造反派才是“一小撮”。

我文革中真正的读书生涯始于清华图书馆。管理员们不像半个世纪前，那位在北大只干了四个月的润之同行那样具有雄心壮志，他们和清华所有的职工（不包括教师）一样兢兢业业地坚持在“最平凡”（其实是“最低下”的别称）的岗位上，为“吃喝玩乐们”服务。

67年夏，我首先通读了建国以后全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人民手册》年鉴中政治方面的文章，约数千万字，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历次政治运动有了全面了解。

秋天，我阅读了“内部书籍”中全部政治类的“灰皮书”。书籍来源除了上文提到的高干子弟好朋友外，还开辟了胡乔木的侄子和胡绳之子等清华同学的新书源。对我影响较深的有：

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我对残暴的斯大林和专制的苏联有了感性的认识，并与毛和中国对比。

南斯拉夫副总统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它将留下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让我对社会主义开始理性的批判。

《第三帝国的兴亡》简直就是文革前传，共和国人民与帝国臣民何其相似乃尔，党卫军就像红卫兵的前辈！（《兴亡》是徐沙带我去北大历史系，向他四中学长胡德平借的。胡讲：“父胡耀邦嘱咐，什么书没了，《兴亡》也不能丢！”我答，“会像和氏璧一样爱护。”阅后当然完璧归胡。）公开发行的《九三年》理所当然地让人对照“六六年”，此二书使我从历史和世界的全新视角审视文革。“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阶级革命和文化革命是否正确，我不知道；人道主义“绝对正确”我认同！雨果老先生的教诲铭记在心，并成为我的绝对价值观。

1968年1月4日凌晨，清华发生武斗，双方伤百人，三十多位入院治疗。33年前，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首创“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现在，失去蒋校长的清华也“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不愿干武斗的部分造反派和不愿被武斗的全部保守派纷纷卷铺盖离校，京民回家、北漂则投靠文斗学校的老乡。

2月5日春节初一半夜，宋克荒突闯我家。他说：“回沈阳探亲，父母被关，我被追捕，逃回北京。到七机部投奔大姐，姐被管制，无处可去，只好找哥们你了。”宋在我家住月余，后投奔没倒霉的某将军。或因文革中来家避难的朋友较多，或因准老年痴呆，此事已忘。四十年后宋故事重提，戏说当年救他一命。我答：“举手之劳，言重啦！林彪和小平之亡，你都冒险在第一时间通知外地和国外的我，才是恩重如山。”

68年春，我读完所有能淘到的“内部书籍”中以苏联文学为主的“黄皮书”，主要来自物00的朋友之父袁水拍（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书库。印象较深的有：《苦果》是“苏联右派”作品集，好似中国右派反官僚和特权作品的俄文版。爱伦堡的《解冻》，“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渴望中国的解冻。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劳改营让我震撼！我认为它是后来获诺奖的《古拉格群岛》的缩本。

而后，我精读了翻译家周煦良受教育部委托主编的高校文科教材《外国文学作品选》，上下两卷精选了从古希腊到现代的几十部精品的精彩章节。阅后按图索骥，我千方百计找寻国内出版的原著，在知识和精神上接受双重洗礼，完成工科生的文学涅槃。

与朋友们骑车游遍北京远近郊区的名胜古迹、风餐露宿寻古探幽，则是这个春天我生活的又一亮色。

### 3、河北农村考察

68年4月23日，清华武斗升级为战斗，由冷兵器升华为热兵器，由零星械斗发展成持续战争，史称“百日武斗”。文革前，清华实行“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如水利系参加密云水库的施工，我系参与核反应堆和粒子加速器的运行。我无奈地调侃：“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背叛。造反派好样的，不忘记清华传统，武斗都真刀真枪地干！”

近期返校已无可能，夏天我和徐沙、顾逸东到物02班何建坤（文革后任清华副校长）的家乡河北安平县，继续我66年的农村考察计划。这里恰巧既是八路军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又是大跃进的模范县。

尽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农民的贫困还是让我们震惊，我们穿的最破旧衣服还是农村的华服。第二天我们藏起手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收音机没敢露面（该知之事有大喇叭）。与66年去广东大相径庭。那次公社干部对社员说：“这是毛主席派来的首都红卫兵，到农村锻炼传经送宝的。”我考察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现状，参加过“忆苦思甜会”，但对17年历史的阴影一无所知。在红太阳照耀的红海洋中，向阳花般的公社社员哪敢向红太阳的红卫兵讲“困难时期”的负面故事。这次，我们不是红卫兵洋学生，而是邻家二小子的同学哥们，随着同学叫二爷爷、三大娘、四哥、五嫂。“人家城里大官的娃娃，跟咱土农民挤一个土炕、啃一屉菜窝头、喝一锅稀糊糊，白给队上和咱自留地干活，还要给钱和粮票。这仨娃子不赖！”有这样的赞美，你什么心里话听不见、什么真实情况了解不到？

文革中我没有朝圣井冈山和延安，但听说老根据地的贫困，现在亲眼看到“中根据地”和“合作化模范县”现实的穷苦。“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似乎是中国农村的咏叹调和主旋律。农民讲述在并无大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自己亲人饿死的悲惨情景，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听。我才知道：遍野饿死者，皆是种田人！

之前在城里，我们曾讨论过共产党最对不起谁：“镇反”的地富反坏？“反右”的右派？“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文革”冲击的干部？贫穷的工人？现在在乡下，我终于有了答案：农民！是根据地节衣缩食养活了红军八路的老区农民！（我们的父母已成“食有鱼、出有车”锦衣玉食的高级干部，他们还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是土农民。）是分分土地踊跃参军牺牲、解放全中国的新区农民！（百万战死内战沙场的农民是烈士的主体，纪念馆和烈士公墓可有其名？）是忍受巨大“剪刀差”盘剥、为工业化作出巨大牺牲的全国公有化农民！是至今没有解决温饱、仍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二等人民——农民！

## 五、在工宣队统治下

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遣61个工厂3万工人，在8341部队（中央警备团）配合下，突然开进清华园。工人被蒯大富派攻击，死5人伤731人。8月，工人宣传队宣布长期进驻清华，要求师生立即返校。9月我们从河北农村回清华，经历了一年半暗无天日的被管制生涯。

### 1、与工宣队的摩擦

毛泽东亲自培养的典型是“六厂二校”（六个工厂和清华北大），印刷“毛选”和“毛像”的新华印刷厂是最革命的第一厂。工物系的工宣队就来自该厂，“工军宣队”的系领导是8341领袖卫队的一位连长。在极左“激情燃烧的岁月”，最左的尖刀插入清华最机要系，是顺理成章之势。我与他们左派的做派格格不入、摩擦不断的原因有三，（1）、经过两年的学习与实践，已初步形成“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愚昧很强大，能禁锢人一世；又很脆弱，你一旦挣脱，任何力量绝不会使你再愚昧！）（2）、我们大字报点名批判的关锋和戚本禹已被毛抛弃，（口头诋毁江青无纸无字，从不承认！）我的反革命帽子不翼而飞。（3）、工宣队对伤亡工人的“团派”恨之，对武斗的“四一四”恶之，对我们“逍遥派”好之。摩擦具体事例如下：

“新抗大”事件。8341那位连长异想天开，让实验室工人用有机玻璃做一米见方的“新抗大”三个字，放在系馆楼顶。我说：“剩余的下脚料不要扔，我要做活雷锋三个字别在胸前。”新抗大在楼顶立足未稳，被迟群发现，勒令取下。我说：“多亏我的活雷锋还没做，否则和你们一样瞎忙活了！”连长想整我，还没来得及，我们就化敌为友了。次日，陈元来找我，连长与陈握手问候，原来他曾是陈云的警卫员。陈元对连长说：“你要早听阎淮的，就不会被迟群训了。”农民出身的连长对首长及其子弟有极朴素和极浓厚的阶级感情，因此对我也不计前嫌，格外照顾。好景不长，军官撤出，系里只留工人师傅。

工人把社会上流行的、学生们生疏的对“毛像”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毛选”的仪式强加给我们。对此我是心中有怨，但既不敢怒更不敢言。68年冬“清理阶级队伍”，派出“可靠份子”外出调查“不可靠份子”的历史情况。我系干部子弟关某池“外调”回来作报告说：“旅馆房间只一面墙有毛像，便自费买三幅贴上，使任何方向都能看到伟大形象。我们坚持天天读，回来已后半夜，旅馆没有桌子，还躺在床上读毛选后才睡觉。”我对这种宗教仪式的不满顿时有了发泄点。讨论中我说：“既然躺着学习，就应该再贴一张主席像在房顶。后半夜已是第二天，你们当日还是没读毛选，还不如我们在学校工宣队的直接领导下，真正天天读了。”同学们跟着挑毛病，学习榜样成了批判对象。

学习解放军，我们64级150人为一个连。连长是新华厂的青工，高考落榜当了工人，文革造反成了左派，在厂里技术不行还挺“刺儿头”，有了工宣队这差事，领导顺水推舟卸了包袱。新华厂轻松了，工物系倒霉了。你从长沙的中专生掌权后如何整知识分子，就能推测出中学生怎么整大学生。例如他规定，宿舍不许插门（怕看反动书籍），听收音机不许用耳机（怕听反动广播）等。饭前在食堂前排队唱红歌，无论数九寒天还是三伏烈日，他认为歌声不嘹亮或音律不整齐就不让吃饭，直到他满意为止。我不由得想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们当面叫他王连——长（弱读），背后称他“王连举”（《红灯记》中的叛徒）。过去我对领导提意见，是人民内部的干群矛盾；现在对工宣队有看法，就是反对主席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可能是敌我矛盾。我私下牢骚：“我没当过亡国奴，不知道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压迫之苦；但我亲身体会到一个阶层被另一个阶层管制之难（四声）。我不是基督徒，没有原罪；考上大学的知识分子在落榜的工人面前，也无原罪！”

69年初进行“整党”，由党员“讲用学习毛选体会”，群众评议通过，方可恢复“组织生活”。第一批安排“讲用”的是工宣队和学生都满意的，顺利通过。第二批是工宣队满意而学生不满的“积极分子”，如上述的关某池，当然没有我。工宣队按照毛泽东“抓三分之一”的工作方法，在关等“讲用”后召集部分同学开会，布置让这批“积极分子”通过。随后的全体群众大会上，我的哥们提出我比关某好，许多“三分之二”呼应，最后我和“积极分子”们一揽子被通过，我是唯一没有“讲用”就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腰杆也硬了点。王连举开口闭口“你们知识分子要接受我们工人阶级再教育”。在学习毛的“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50字建党方针”最新指示时，我虚心地向不是党员的王连长请教我的困惑：“根据毛主席一分为二的观点，无产阶级由党员的先进分子和党外的落后分子两部分组成。知识分子党员的先进分子如何接受党外落后群众的再教育？”他当然无言以对，只能在毕业分配时惩罚我。

我上述的“阶层管制论”和“落后再教育论”在朋友圈中流传。北大国政系的李海文多年后还记忆犹新，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经过及影响》提到此事。（2011年《炎黄春秋》第3期）

老人家75岁生日那天想起了我们，他说：“即使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子女，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工宣队召开全校“可教子女”的千人大会，自然也忘不了我，还想让我典型发言。我说：“家父虽被定为走资派，但现未死仍然健在，尚不属于死不悔改。而根据二分法，参会者是可教子女，不与会者就是不可教子女吗？”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与会但不发言。是日发言者，我熟悉的有萧华之子萧云和刘瑞龙之女刘延东。我对人对己的要求是“两个不损害”，即：不损害己之尊严、不损害人之利益。因之，我不耻于发言者。出社会，方知世事之艰辛，对人不再苛求“不损己之尊严”。对人及事，皆取“了解、理解、谅解”的“三L解”态度，八十年代与刘等仍为好友。

## 2、毕业离校赴西北

69年9月，广播传出《烈士魂》哀乐，越南领袖胡志明逝世。陈元、宋克荒、刘泽彭和我讨论形势，一致认为：中国的《烈士魂》播出前，文革混乱的局面不会结束，我们应养精蓄锐充实自我，静待天子归西，届时再展身手。他们也劝戒我锋芒“避”露，少惹是非。

回顾工宣队在清华的历史，工宣队的最大功能就是管制和整治知识份子。使我们从整体意义上成为“再教育”、“给出路”、“可改造”的文革对象。一工宣队头目说：“什么时候知识份子的心情舒畅了，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了问题。”这赤裸裸地道出了工宣队以知识份子为敌的心态。（唐少杰《一叶知秋》，P285，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2003年），——不是我喜欢招惹是非，只是我不情愿被别人“心情舒畅”地管制和整治而已！

70年初，在工厂劳动十个月后，突然被召回学校进行毕业分配。原因是清华和北大准备招收工农兵学员，要为他们腾校舍。工宣队实行毛泽东的法家路线：论功行赏、有仇报仇、奖惩分明。具体方案是：“连级干部云集大连，落后学生发配新（疆）西（藏）兰（州）。”我则连兰州都不如，是火车过兰州再开一天的甘肃武威县，古称“凉州”，其荒凉可想而知。“布尔什维克”们也都没好果子吃：陈元分在湖南新邵县，刘泽彭分在吉林梨树县；宋克荒听造反派赞美林彪江青，气不顺说了不恭之话，被定为反动学生留校审查。我们离校后书信不断、互通情况。71年春节，北京探亲再聚会，四人交流了通信不便谈的思想。最重要的是陈元通报了九届二中全会的内幕，特别是毛在庐山会议结束时说的“事情没有完”。我们分析了毛林的性格和处事方略，都预感还有大事将发生。71年9月下旬，我

在甘肃接到宋克荒北京来信，告知“老虎和爹娘摔死在内蒙古”。72年春节，我们四人在北京重点研习林立果的“五七一计划”，认为公布它是毛乱了方寸，有利于民众的觉醒和文革的破产。这是我们70年代初的交往，友谊持续着，政治上的再次交往是80年代初，而80年代末的一场“风波”使我与他们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只保留着私人情谊。

70年3月，登上西行列车，经过两天两夜只坐不躺的艰苦旅程，奔赴遥远的西北陌生小城。24岁的我，确实想到五十七年前，一个同样24岁的青年，在同样的春天，同样背井离乡远赴西北。我们同样“一事无成、一文不名、一无所有，但是拥有不可抑止的自信心和深刻炽热的使命感。”（引自《第三帝国的兴亡》）他就是我深恶痛绝的阿道夫。第二感觉有点革命性了：我像冲出牢笼、将在广阔天地自由翱翔的海燕，“在乌云和大海之间，高傲地飞翔，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高尔基《海燕》）

此后5年，通过艰苦卓绝的“我的奋斗”，在工人、技术员、车间主任、厂长的路线图上，爬到县团级的武威煤矿机械厂的顶层。在全面整顿和回潮的1975年，对口调到北京煤矿机械厂。对着清华园大喊：“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结语

清华文革的四年，我犯过严重错误，也有丰硕收获。文革前，我是一个狂热的极左毛粉。文革初，看到许多基层的问题，以为是歪嘴和尚把马列毛的正经念歪。中期，对党内高层残酷内斗的了解，知道大和尚晚年嘴也歪了。后期，认为马列当年是真经，斯大林和毛泽东“跑偏了”，好经也要与时俱进。我们的使命就是拨歪返真、修正旧经，净化党的领导、完善社会主义，作补天救党派。

文革中的我，通过深入城乡社会底层和研读先贤哲人经典，树立了平民意识，成为干部子弟中的异类。维克多·雨果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成为我的绝对价值观。中组部的我，86年到许多省的组织部和党校抨击时弊鼓吹政改。有人指责：“你天天吃党的，日日骂共产党！”我笑答：“你们天天夸党，是日日害党，我是在救党！”八九风波后的我，不愿再“同流合污”，出走了。89年9月20日我在《欧洲日报》上写出我的理想社会是：民主政治、自由经济、独立司法、保障人权。——好像与党现在的诉求雷同，是吗？

作者简介 阎淮，45年产于淮安。中学在圆明园，64年就近潜入清华窃得物0班长，次年混进党。70年发配凉州，后在煤炭部当差再到中组部听喝。风波后游走欧美亚，卖方块字谋生。中国公民暂居美国，从心所欲不逾矩时，叶不落归树。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